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影响研究

任楠 邓刚 张雅琪 齐鲁理工学院

摘要 在全球经济数智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企业传统财务管理面临决策滞后以及人才技能与现实需求脱节等问题。本文探讨了数智转型对财务管理,特别是财务信息处理、财务部门结构以及融资管理方式的影响;分析了数智转型与新质人才培养的双向驱动关系;并从课程体系设计、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加强国际合作、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强化校企合作等方面提出构建具有前瞻意义的新质财务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数智转型;财务管理: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15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5.0704.134-146

引言

关于企业的盈余管理,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话题,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和企业外部的投资者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随着新兴会计准则的陆续推出,学术界已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企业管理层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过程中,依托会计准则进行盈余调节的行为,此举可能致使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受损。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屡见不鲜的财务舞弊现象,若从简单的财务作假扩展至财务风险暴露等更为广义的问题,涉及的事件将更为复杂。在我国的相关政策体系未完全成熟、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尚未完善的宏观背景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已成为财会领域研究的重点议题,亟待学术界深入探讨与研究。随着市场外部环境的形势愈加复杂,企业针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治理机制也随之变化,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也变得更加复杂,学术界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探索也未曾停下。

关于企业盈余管理,学术界长期将其视为财会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新会计准则的不断推出,盈余管理通常被界定为管理层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过程中,利用会计准则的灵活性进行盈余调节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削弱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决策价值。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财务舞弊事件频发,若从单纯的财务造假拓展至更广义的财务风险暴露,其影响和复杂性更为凸显。在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仍待健全的宏观背景下,盈余管理已成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外部环境复杂性增强,

[©] The Authors 2025. 收文记录 Received: 19 May 2025; Accepted: 25 June 2025; Published: 31 August 2025 (online). 社会科学理 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Email: wtocom@gmail.com,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CPCL™)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which permits non-commercial use, sharing,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provided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source are credited, and derivative work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same terms.

企业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动因亦呈现多元化特征,因此,探讨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与治理路径,仍是学术界亟需深化的重要研究方向。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其配套硬件的快速迭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5G 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全链条不断突破,推动形成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不仅在产业层面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更在国家战略层面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它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与治理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能。作为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及分配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使得经济运行方式日趋优化和高效化。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企业的管理架构、经营模式、产销流程,释放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增长潜力。立足于当下的时间节点,国家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其蕴含着极大的内在潜能,发展数字经济也是国家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数字中国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驱动力,并为增强国家竞争力注入新的动力。回顾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历程,国家层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扶持和促进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党的十八大胜利举行之后,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核心战略被提出并加以强调。该战略的关键在于推进科技和传统工业的全方位结合,借力于科技创新促进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明确了推动数字经济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的要求。涵盖了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链条各环节,持续激励各企业深入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诸多任务。

本文以海尔智家为案例,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提升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助力企业长期平稳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海尔智家的发展历程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路径和效果,然后采用了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海尔智家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通过访谈、年报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然后应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等步骤,从文本资料中归纳出数字化转型影响盈余管理的概念和类别,并为每个类别赋予属性,最终通过故事线的方式建构了路径理论模型,即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与盈余管理的程度呈负相关,且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可操作性等途径,影响其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将理论模型和命题与资料进行比较和验证,发现它们能够很好地解释和概括海尔智家的案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并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精炼和完善,使之更加清晰和严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

尽管在 21 世纪初就出现了针对数字化转型的讨论和研究,但有关其度量的研究却相对滞后了一些。仅有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进行研究,针对企业等微观层面研究较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国家战略层面,逐步建立了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评估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再由众多会员国政府与地区机构进行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关键基础工作。刘晓雅①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熵权法,确立数字经济概念并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构建相配套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省级层面上,刘军、杨渊鋆等②基于互联网发展、信息化发展和数字化交易发展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层面,赵涛、张智等人③通过构建包含互联网发展与数字经济在内的多维度评估体系,定量刻画城市数字化水平。企业层面,相较于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刘政、姚雨秀等④认为可以通过企业

①刘晓雅:《基于价值链攀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与调控策略研究》,沈阳工业大学,2024年。

②刘军、杨渊鋆、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第81-96页。

③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第65-76页。

④刘政、姚雨秀、张国胜等:《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9期,第156-174页。

单位新增固定投资下的软硬件信息设备投资率来反映企业数字化程度;类似的,舒伟、曹晶等人①利用固定资产项下的电子相关设备、无形资产项下的软件相关资产,进行数字资产的度量;何帆、刘红霞②则根据企业是否进行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变革来进行研究;祁怀锦、曹修琴等③认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度量可以参考年末财务报表无形资产项中,与数字经济相关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闵泽豪④、任碧云等⑤、胡秀群等学者⑥依托文本分析技术,深度解析企业年度报告,从中提取涉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词汇,并开展词频分析。为了定量描述企业数字化建设的进度,创设了一个测量指标:将单一企业当年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同期行业整体的关键词累计频次之比,作为量化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指数变量。

(二) 盈余管理相关研究

本研究聚焦于应计盈余管理,即通过企业会计估计与政策选择等途径,在财务报表中调节盈余结果的 行为。尽管真实盈余管理同样构成盈余操纵的方法之一, 但鉴于研究范围和目标的具体界定, 对其进行的 分析与讨论相对有限。在盈余管理手段中, 应计盈余管理是一种会计操作活动, 其内容主要包括经营现金 流量净额以及应计利润两个方面。由于对企业现金流量的直接控制存在困难,故管理层往往通过调节应计 利润来实施盈余管理。应计利润的包括可操作性与非可操作性部分,本研究的关键是计算并分析企业可操 控应计利润与总应计利润的比值,以此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为衡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占总应计 利润的比值,可以选择相应的度量模型——DD 模型、迪安吉模型、琼斯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等。关于 上述模型对当前中国市场的适用性,尚需学术界进一步采用实证调研方法深化探究。实际情况表明,在盈 余管理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普遍采纳 Jones 模型或其修正模型进行相关研究。比如黄梅和夏新平(2009) ②通过检测应用琼斯模型后所产生的错误频率,认为经修正的琼斯模型在模型的设定更为科学且对企业盈 余管理行为的检验能力更强,更适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 黄海杰等人®在研究中也使用了修正后的 Iones 模型来计算盈余管理程度。除了利用模型度量盈余管理程度、管勇⑨采用分析财务报表的方式度量企业的 盈余管理程度,具体通过分析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度量盈余管理情况。关于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主要分 析两个指标,一个是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另一个就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围绕这两个指标,探 讨其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在控制其他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后,第一指标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 显著的正相关性, 第二指标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则显著的负相关。除了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也清晰呈现了 企业在报告期间内的营运成果及其经济活动表现。关于利润表,可以计算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重,该指 标和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

(三)数字化转型与盈余管理关系

尽管研究领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层面效应给予了广泛关注,但基于微观层面,即从企业内部机理出发深入剖析其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文献仍显稀缺。罗进辉和巫奕龙¹⁰⁰选取真实盈余管理视角,深入剖析了数字化营运模式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机制,提出并验证了数字化营运有效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

①舒伟、曹晶、曹健等:《企业信息化投入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第115-127页。

②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改革》,2019 年第 4 期,第 137-148 页。 ③ 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改革》,2020 年第 4 期 第 50-64 页。

⁽⁴⁾ 闵泽豪:《创新驱动背景下零售企业数字化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商业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第 120-123 页。

⑤ 任碧云、郭猛:《基于文本挖掘的数字化水平与运营绩效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1 年第 6 期, 第 51-61 页。

⑥胡秀群、何梓维、李宗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第47-57页。

⑦黄梅、夏新平:《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检测盈余管理能力的实证分析》,《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5期,第136-143页。

⑧黄海杰、吕长江、丁慧:《独立董事声誉与盈余质量——会计专业独董的视角》,《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第128-143

⑨管勇:《内部审计对提高企业盈余质量的研究——以美的集团有限公司为例》,《纳税》,2017年第22期,第8-9页。

①罗进辉、巫奕龙:《数字化运营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管理科学》,2021年第34卷第4期,第3—18页。

为的观点,并通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信息公开度提高这两个途径,具体阐释了其作用机制与实践意义。倪国爱和江寅炜①选择中国 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并进一步揭示了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两个主要的影响机制。研究深入探讨了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分析这两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尤其是在抑制盈余管理现象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有效地对企业盈余管理活动产生约束效应。然而,关于二者的作用机理的探讨在现有文献中尚显不足,学术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

关于数字经济的度量,此前的相关研究探讨了从国家到省市乃至企业层面的不同视角,本研究是针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深入对比,本文选择借力于文本分析法,构建出一套科学的数字化转型词汇体系,对年报中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等进行统计分类,并根据相关公式将其指数化,以达到度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目的。针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度量,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修正后的 Jones 模型在相关度量方面显示出更优异的性能。因此,本研究选择采用该修正模型作为核心分析工具,以计算出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在应计利润总额中的比例,作为衡量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键指标。

二、案例介绍

本文研究方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选择案例企业为海尔智家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在当前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数字化技术进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家电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积极投身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队伍,而海尔智家又是行业中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其持续聚焦实业,提前谋划发展战略,基于科技创新为全球用户量身打造智能化生活模式,与此同时增强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与运营能力,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助力,并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二,海尔智家较早步入信息化,数字化阶段。1995 年海尔智家就提出了企业信息化战略导向。2012 年,海尔智家正式开始实施网络化发展战略,走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历经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效果拔群,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品牌价值,并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取得了重大成果,因此无论从数字化转型时间长度和数字化转型后的效果,海尔智家都满足本文所需案例的条件。第三,海尔智家作为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公开程度均较高。在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论述篇幅也很多。此外,众多研究机构及媒体也频繁发表涉及该企业的研究成果、推广文献及人物专访等多元内容。由此可见,存在丰富有效的数据资源供本文进行深入分析。方便查阅相关资料并进行对比分析。

三、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

(一)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动因

1. 满足市场要求,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首先,家用电器制造业呈现出产品功能同质化严重的趋势,消费者对中高端智能化家电的偏好愈加明显。其次,由于家电制造业企业众多,现阶段市场竞争激烈,且不断有新的企业试图进入市场,特别是在中低端市场领域,这种竞争态势更为显著。智能化已逐渐成为家电消费的主流趋势,全屋智能家电产品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企业务必实现智能化转型。与过往侧重于制造能力的时代不同,当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逐渐转移至服务能力、数字化能力以及这两者与传统制造能力的有效整合上。如果企业

①倪国爱、江寅炜:《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38 卷第 3 期, 第 37-43 页。

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革趋势,就可能遭遇用户流失、被竞争对手超越,乃至从市场中被淘汰的危机。因此,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进行市场定位,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至关重要,这将是其在未来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基石。基于上述分析,海尔智家已着手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是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度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家电制造业市场的需求,同时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2. 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新模式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领域的加速进步,企业经营模式发生了显著变革,生产销售等关键业务环节变得更为高效与灵活,并逐步形成线上与线下相互促进的销售新格局。在此技术背景下,企业得以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市场需求进行精确捕捉,实时对产品制造流程进行调整优化,以此控制成本并减轻存货负担。海尔智家,为削减生产成本并简化组织架构,通过积极整合供需两端资源,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效能提升。其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于生产与销售策略中,指导生产过程,以精准分析市场需求,构筑统一标准的闭环供应链体系,深化信息互动机制,同时开拓销售渠道,更好地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3. 改造企业内部管理模式

尽管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源配置对组织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管理要素才是决定企业未来发展 走向的根本性要素。企业之所以着力变革管理模式,根深蒂固的目标在于保障企业得以持续稳健地成长, 确保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海尔智家在其发展初期,曾施行科层化管理架构,纵观该 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员工偏重个人利益而忽视顾客需求、信息沟通不畅、层级传递迟缓等问题。在 客户导向理念的宏观背景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成为当下必然趋势。基于此,海尔智家在其转型升级的 进程中,积极探讨并实践数字经济背景下所需的企业管理新框架及新模式,目的是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 发展潮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路径

1. "人单合一"的商业模式

"人单合一"是一种商业管理模式,该模式将员工和用户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员工为用户创造价值来 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满足用户的需求,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发展。相较于传统管理模式,该模式在目 标上追求的是创造终身用户,而非长期利润最大化,于是更加注重价值的创新和积累。此外,其逻辑结构 也有所不同,更加重视员工和用户的互动关系,强调员工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内在动力的提升。随着数字 化浪潮席卷全球经济版图,企业亟需刷新管理理念以迎接这一时代大潮。在此背景之下,海尔智家凭借前 瞻性管理策略,成功转化"人单合一1.0"管理模式,建立起员工与用户良性互动的新型合作格局。伴随 数字化深刻变革,"人单合一"模式亦升级为深度融合利益相关方的"人单合一 2.0"新模式,其用户至 上的理念,为用户带来了贴心的服务体验。以"人单合一"的商业模式转型为主要切入点,海尔智家进行 了一系列变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传统股东价值优先的框架转变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的服务中心模式,从而推动价值生成的源动力。通过密切与用户沟通,深挖用户个性化需求,并据此打造 出切合市场的个性化产品线,进而贯彻用户反馈的快速对应,刷新产品的功能与市场地位。通过这一连串 举措,海尔智家有效打通了解决用户需求与体现企业价值的双向通道,充分实践了"人单合一"共赢的商 业智慧。另一方面,海尔智家实施了一种新型的员工价值实现方式,即由"人单合一"转变为以员工自我 价值实现为导向的平台模式。新的模式下,员工所创造的价值以用户价值为中心,由员工充当驱动企业价 值的人物和价值的创造者。最后,"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其支撑平台为多边共享平台相互连接的支持系 统,具体可以参考海尔智家旗下的 COSMOPlat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平台,该平台实现了企业、用户、供应 商等多方利益关联者在同一平台内的深度融合,共同绘制了共创共赢的生态圈,堪称多边平台的典范之 作。COSMOPlat 不止于连接用户价值,更将创业个体及创新价值资源进行跨界链接,通过高效配置生态 资源,达成用户、创客及企业三方价值的有机统一与协同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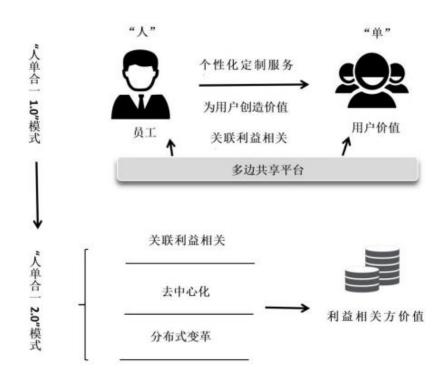


图 1: "人单合一"商业模式战略图

2. "无边界"的组织结构

自 2006 年以来,海尔智家组织架构经历了从传统的"正三角"向"倒三角"模式的根本变革,这一转变本质上受到了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模式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倒三角"组织模式下,其最大亮点在于能够包容性地整合各方反馈信息,其运作逻辑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而非自上而下的管理层指令。这种模式能够主动融合市场资源,转变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规避了传统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中间层造成的滞后性,通过构建节点型网络结构,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此外,随着结构的优化,公司在迅速适应和响应市场变化的同时,也使技术更新上的风险得以降低。据此,海尔智家已逐渐转型为一家集中配置各类企业资源的市场平台,其在体系结构上精心搭建了三大板块。其一,平台主体,作为投资项目的支柱企业,专注于小微企业领域的服务与扶持。其二,归集众多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缺乏规模经济的优势,但具备潜在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其三,包括创客在内的各类创新组织。公司不断改革人才管理机制,将全体员工纳入创客文化培养体系,激励员工由原先的顺从执行者,转变为自发创新的主体,不断挖掘个体潜能,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为海尔智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尽管创客组织甚至不如小微公司的规模大,但依旧是现代化数字经济网络中必备的一部分。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用户开始以生产消费者的身份参与全流程的价值创造,在不断交互和参与中从单一角色向多重角色转化。

3. 一站式"智家体验"

不同于简单的家居购置行为,海尔智慧家庭致力于满足用户对于沉浸式生活体验的深层需求。通过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体系,实现了日常居家生活环境与用户之间的紧密互动。为此海尔推出了实时与用户进行交流互动的新型生态场景品牌——"三翼鸟",该品牌基于一个独立的互动平台正式发布,进一步促进了智慧家庭生态的融合与发展。其能够满足家庭多种场景需求,包括但不限于阳台、厨房、客厅、浴室、卧室等区域,通过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可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全覆盖的生活需求解决方案。同时,依托体验云等新兴数字技术,与用户进行深层互动与交流,通过智慧家庭场景的解决方案,吸引来自不同行业及领域的企业参与,达成深度的捆绑合作,并共同融入海尔智家的独立平台之中。海尔智家通过融入"三翼鸟"场景营销新理念,重塑了智能家居界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场景营销新范式,也为智能家居行业注入创

新活力,显著提升了用户生活品质,有效解决了传统家居装饰模式的诸多限制,同时也标志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项创新性突破。

(三)海尔智家数字化程度度量

因海尔智家年报中的语言多为中性表达,修饰性、口语化语言有限,且企业披露的数字化转型信息多采用非结构化文本描述,因此本文决定使用文本分析方法,主要借鉴胡楠等构建文本指标的思路,以海尔智家公司年报为数据提取池,人工提取"数字化转型"种子词汇,构建数字化转型词集。具体构建流程如下所示:

- 1. 确定数字化转型种子词集。首先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等标准文件为初始检索词源,再基于有关论文中的"数字化转型"词集提取关键词,归纳整理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作为补充,最终得到种子词。经过此番人工操作后,确定了数字化转型信息在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位置、表现形式及初始关键词,为后续扩充词集奠定了基础。
- 2. 确定数字化转型扩充词集。在文本中,描述同一概念或事物,往往会出现多个语义相近的词汇,由于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特点是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因此数字化关键词不仅包括"数字化"本身,也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词汇。因此需要对种子词进行近义词扩充,以提高关键词选取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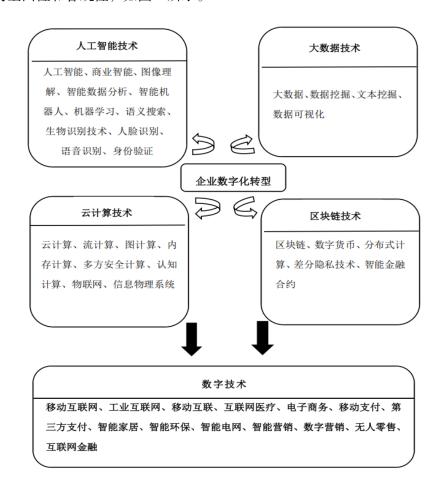


图 2: 数字化转型词汇图谱

3. 依据选择出来的数字化转型词汇进行筛选,最终确定数字化转型词汇出现频次。最终,统计整理出海尔智家 2014 至 2022 年间年报中上述数字化关键词中出现频率较高词汇的出现频数,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 数字化关键词词频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数字化	0	0	1	0	2	5	4	5	39	43	44
智能化	4	15	8	7	7	4	7	3	10	9	5
信息化	3	2	4	4	4	6	4	4	5	3	3
大数据	0	2	6	7	7	8	3	8	13	12	7
云计算	0	1	0	0	2	2	1	1	2	4	3
物联网	4	3	2	4	13	17	25	28	24	23	21
IoT	0	0	0	0	0	0	4	6	8	3	1
互联网	11	22	14	18	10	5	11	5	4	6	3
人工智能	0	0	0	2	2	2	3	1	5	11	5
企业总计	22	45	35	42	50	49	67	72	103	110	92
行业总计	13	22	27	34	37	43	55	53	77	79	75
				ا ا ا ا ا ا ا	4	111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CSMAR。

数字化度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Digital_{i,t} = \frac{keyword_{i,t}}{totalkeyword_{i,t}} \tag{1}$$

其中, $Digital_{i,t}$ 表示该企业当年的数字化发展指数, $keyword_{i,t}$ 表示该公司当年的企业数字化发展关 键词频数, totalkeyword_{i.t} 表示该公司所处行业当年总的关键词频数。

表 2: 海尔智家数字化发展指示表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指数	1.69	2.04	1.29	1.29	1.35	1.13	1.22	1.35	1.33	1.39	1.45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海尔智家自 2012 年开始,就在其发展战略中布局数字化,年报中有关数字化的 相关词已出现。但是也不难发现,2012、2013年报中虽然有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等相关词的出现,却 没有数字化这一直接表达, 且根据词义、上下语境以及公司实际行为可以发现这些词汇主要集中在公司对 未来发展的展望的篇幅中,实际行为较少,且即使有实际行为也仅仅处于试点状态,虽然对比行业整体而 言数字化发展略早,导致其数字化指数高,但严格意义上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大。直到 2016 年海尔智家年 报中才真正出现了数字化这一词汇,在之后的几年内数字化转型词汇出现频率更高,其发展指数也保持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四、海尔智家盈余管理度量

经过前期的文献研究,本研究发现在多个度量盈余管理的实证模型中,琼斯模型经过修正后表现卓 越,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选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度量。修正后的琼斯模型计算公 式:

$$TA_{i,t} = \alpha \frac{1}{A_{i,t-1}} + \beta \frac{\Delta REV_{i,t}}{A_{i,t-1}} + \gamma \frac{PPE_{i,t}}{A_{i,t-1}} + \varepsilon_{i,t}$$
(2)

其中, $TA_{i,t}$ 是企业 i 第 t 期的应计总利润,即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A_{i,t-1}$ 是企业

i 第 t-1 期期末的资产总额; $\Delta REV_{i,t}$ 是企业 i 第 t 期与 t-1 期之间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 $PPE_{i,t}$ 是企业 i 第 t 期期末的固定资产。

对上述模型进行分年度分行业的回归,得到相应的回归系数 α , β , γ , 然后将估计出的系数代入以下公式,估计出每一年的不可操控应计利润:

$$NDA_{i,t} = \alpha \frac{1}{A_{i,t-1}} + \beta \frac{\Delta REV_{i,t} - \Delta REC_{i,t}}{A_{i,t-1}} + \gamma \frac{PPE_{i,t}}{A_{i,t-1}}$$
(3)

其中, $\Delta REC_{i,t}$ 是企业 i 第 t 期和 t-1 期应收账款的变动额,得到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_{i,t}$ 。 最后,将应计总利润减去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就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再取绝对值,也就是本文的 盈余管理指标 $DA_{i,t}$:

$$DA_{i,t} = |TA_{i,t} - NDA_{i,t}| \tag{4}$$

在从公司年报中收集计算所需的相关财务数据, 计算得出海尔 2018-2022 年盈余管理指标数值。见下表:

表 3: 海尔智家盈余管理指标数值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overline{DA_{i,t}}$	0.983	0.979	0.969	0.967	0.950

五、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

(一)相关指标分析

上文已经将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程度度量为数字化发展指数,并应用琼斯模型将其盈余管理程度指标化。接下来,我们选取近五年的海尔智家数字化指数和盈余管理指标,对其进行分析。首先将其汇总如下表:

表 4: 相关指标分析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数字化指数	1.22	1.35	1.33	1.39	1.45
盈余管理指标	0.983	0.979	0.969	0.967	0.950

再根据该表绘制折线图以反映其变化趋势,寻找内在联系: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出,海尔智家数字化指数呈稳步上升状态,尤其是在 2019 年呈爆发上升态势,并在 2022 年达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其盈余管理程度呈走低趋势,在 2022 年达到最低点,其变化幅度也与数字化指数变化幅度大致相同,因此本文作出合理假设,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盈余管理,其数字化程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

(二)财务报表分析

本部分通过分析 2018 年-2022 年海尔智家财务数据,从而对上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盈余管理程度作出补充。具体分析分析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相关指标。虽然不能直接通过资产负债表直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但是对其各类资产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则可以进一步判断企业的盈余管理情况。本部分主要分析两个指标,一个是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另一个就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围绕这两个指标,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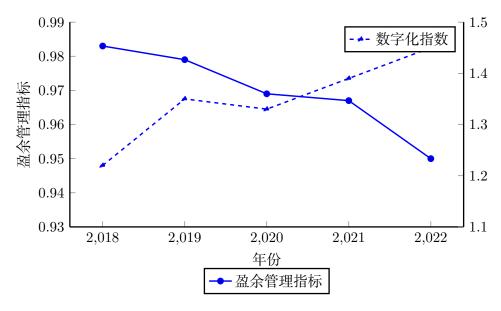


图 3: 数字化及盈余管理指标趋势图

讨其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在控制其他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后,第一指标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第二指标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则显著的负相关。本文搜集海尔智家 2018-2022 相关的财务数据,通过数据分析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变化趋势:

表 5: 应收账款及其主营业务收入						
年份	应收账款	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2018	12,891,199,940.00	162,823,173,116.10	7.92%			
2019	10,431,193,487.50	182,494,232,298.13	5.72%			
2020	11,015,871,060.09	199,470,697,570.75	5.52%			
2021	14,625,260,856.04	226,120,377,524.14	6.47%			
2022	15,913,691,537.11	242,431,313,231.23	6.56%			

根据该表,将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和企业数字化指数绘制成折线图的形式,以便观察出其变化趋势。

我们可以从表 5 中可以看出海尔智家 2018-2022 年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7.92%、5.72%、5.52%、6.47%、6.56%。2018 年的比重最高,达到了 7.92%, 2019 年则下降至近几年的最低点 5.72%,此指标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可以反映出在 2018 年海尔智家盈余管理程度达到近五年峰值后,2019 年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并在 2020 年达到最低点,即使在随后两年略有上升,但也整体趋于平稳,并未突破 2018 年的峰值,所以我们可以得知 2018-2022 年海尔智家的盈余管理程度是有所降低的。从图 4 中,也可以明显看出随着企业 2018-2022 年数字化指数呈稳步提高态势,其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稳步下降。

再来,我们分析海尔智家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根据该表绘制应收账款周转率和企业数字化指数趋势图,以反映其变化情况:

从表 6 可以看到 2018-2022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2.68、17.57、18.22、15.56、15.30,因为这个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其可以大概反映企业在这几年间的盈余管理程度,从图 5-4 可以看出 2018-2020 年,随着海尔智家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应收账款周转率先是升高,随后两年内略有下滑,本指标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因此可以得出盈余管理程度呈明显降低趋势,在随之的两年内,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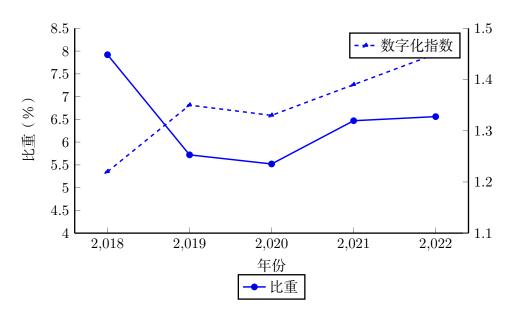


图 4: 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与数字化指数趋势图

年份	应收账款	销售收入	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8	12,891,199,940.00	163,428,825,488.56	12.68
2019	10,431,193,487.50	183,316,560,236.03	17.57
2020	11,015,871,060.09	200,761,983,256.57	18.22
2021	14,625,260,856.04	227,556,143,618.17	15.56
2022	15,913,691,537,11	243,513,563,670,73	15.30

表 6: 应收账款、销售收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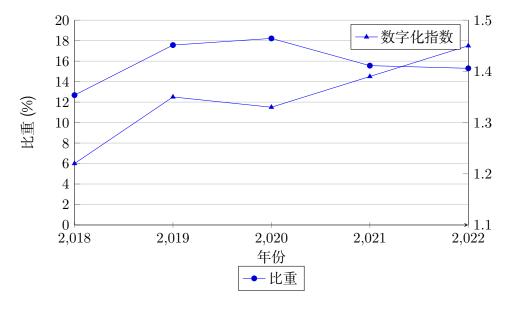


图 5: 应收账款周转率趋势图

0.90%

有回弹,但也没有超过18年的水平。本部分的分析与海尔智家2018-2022年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的分析结果相似,提高了海尔智家随着数字化程度提高,盈余管理程度有所下降的分析的可信度。利润 表是反映公司当期经营成果的动态报表。关于利润表,我们需要计算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重。

表 7: 净利润及具宫业外収入						
年份	净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比重			
2018	9,770,599,861.25	474,156,808.14	4.90%			
2019	9,021,527,220.76	390,971,548.74	4.30%			
2020	11,322,616,277.28	197,945,472.39	1.70%			
2021	13,232,259,371.01	199,068,358.48	1.50%			

根据该表,将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的比重和企业数字化指数绘制成折线图的形式,以便观察出其变化 趋势。

136,527,269.96

2022

14,732,181,61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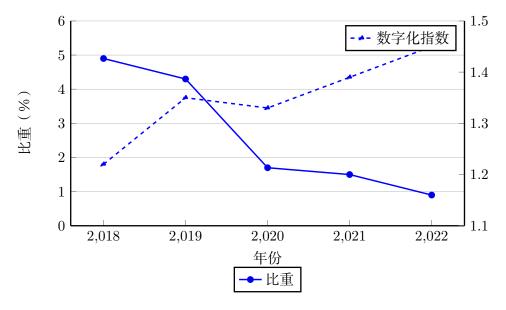


图 6: 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趋势图

根据表7我们可以得知从2018年到2022年间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重分别为4.90%、4.30%、1.70%、 1.50%、0.90%。从图 6 可明显看出海尔智家数字化程度不断上升,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趋势呈逐年下降, 收集资料可知该指标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故也可以理解为盈余管理程度稳步下降。因此可以初 步分析出海尔智家盈余管理程度随着数字化程度提高在 2018-2022 年呈明显下降趋势。综合以上三个财 务指标进行的相关财务分析,都可以结合趋势图明显看出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企业盈余管理现象 得到抑制,从而验证了上文做出的假设。

基金项目 1.2025 年山东社科联入库课题开源 AI 大模型赋能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与路径研究; 2. 齐鲁理工学院社会科学人才课题:一带一路框架下低碳节能企业国际化推进路径研究(QIT23TP027); 3. 齐鲁理工学院校级科研计划项目: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影响研究(OIT24SN011)。

作者简介 任楠, 女, 汉族, 1996年10月出生, 会计硕士, 齐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跨 国企业经营、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等,邮箱:rennansd@163.com。

邓刚,男,汉族,1971年5月出生,管理学博士,齐鲁理工学院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绝热材料协会副会长兼绿色低碳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跨国企业经营、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及建筑节能等,邮箱:denggang@qlit.edu.cn。

张雅琪,女,汉族,1998年11月出生,会计硕士,齐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跨国企业经营、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等,邮箱:1361103759@qq.com。

引用本文 任楠, 邓刚, 张雅琪. 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影响研究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5, 7(4):134-146.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15.

Cite This Article Nan REN, Gang DENG, Yaqi ZHANG, . (2025).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rnings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7(4):134-146.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15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rnings Management

Nan REN, Gang DENG, Yaqi ZHANG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traditional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delayed decision-making and a mismatch between talent skills and real-world deman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in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partmental restructuring, and financing management method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bidirectional dri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quality talent. Finally,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forward-looking model of cultivating new-quality financial tal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ience-education synerg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stering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nhancing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Key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cultiv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talent

〔责任编辑: 黄乙恩 Email: wtocom@gmail.com〕